

穿行在新加坡和中国：蓉子文学创作论

◎ 白舒荣

摘要：穿行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女作家蓉子，是从报纸专栏走出来的。从蓉子成长和经历看，她不畏艰难，勇敢坚韧，其作品也展现作者自身的这种品格。回国探亲之后，生活重大转折为其创作注入新养分、新活力。无论在他乡还是故乡，她的文学创作可谓笔笔正能量，满满家国情。她以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行进在永远的路上。

关键词：女作家蓉子 新加坡和中国 文学创作论

新加坡华文作家蓉子自称是“三国五朝小民”。1949年初，她出生在中国；8岁随养母下南洋，落足英属马来亚；半年后马来亚脱离英国殖民建立马来亚联邦；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同沙巴、砂拉越，以及新加坡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；1965年她去新加坡工作定居。三国五朝不折不扣。

一、新加坡蓉子：从报纸专栏走来

蓉子出生在潮州金石镇陈厝垵，本名赛蓉，生身父陈姓，她随养父姓李，全名李赛蓉。4岁的她被送给了不育的亲姨母。在姨母那儿最常领到的礼物是令她肝胆俱裂的“泄愤般地打打打”。8岁时离开潮州家乡，随姨母漂洋过海到马来亚与姨夫团聚。姨夫在杂货店当伙计，收入低微，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简陋大杂院。她立刻担负起洗衣烧饭、提水劈柴、养鸭洗地等繁重的家务劳动，稍有差池，小则被敲头拧脸，大则被烧火木柴痛击手指，或者用麻绳套在她脖子上，勒一勒松一松，姨母还恶狠狠地威胁：“你要死还是要活？”让她心志不死的是书本。她非常爱读书，虽然是班上的穷学生，连练习本都买不起新的，却下课后偷偷做拔鸭毛的杂活儿，挣钱买故事书看。

她以4年的时间完小毕业，勉强又念了二三年英文中学，便因家穷辍学，开始四处流浪打工。后来结婚成家，满怀希望投入新生活，担任起新角色。蓉子婚后在新加坡自家的小天地里，洒扫庭除，买菜做饭，做毛绒玩具等手工活贴补家用外，从小爱书、恨自己读书少的她，从没放下过书本。翻破了《辞源》，熟读《古文观止》《红楼梦》，民国年间老舍、张恨水等等名人著作，尽量借来阅读。看的多了，难免技痒，悄悄动了写作的念头。

1969年，她把厨艺心得写就的一篇以《食谱——猪肉蒸蛋》为名的小稿，化名雪兰，寄给《南洋商报》。不料竟被刊登了，恰逢长子出生。她欣喜万分，觉得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意，暗示写作同儿子一样，注定都是她的生命之重。

《南洋商报》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，由新加坡殷商陈嘉庚于1923年9月6日在新加坡独资创刊。1965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家，南洋商报一分为二。与《南洋商报》并驾齐驱的另一份华文大报是《星洲日报》。除此外，还有华文报《新明日报》，其文艺副刊很受读者欢迎。《新明日报》为新加坡华文下午报之一，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发行，于1967年3月18日创刊。创办人是香港著名小说家金庸和新加坡商人梁润之。

第一篇小稿见报后，她又陆续写了一些妇女版的文章。70年代初，她试着投稿给《新明日报》的文艺版“新风”，并没抱多大希望。不料几天后在“新风”版，发现有个叫“蓉子”的写了一篇《闺怨》，看内容，竟同她写的一样。再仔细读，除了改掉几个字添上两句诗，明明就是自己投的稿啊！正纳闷，发现版面当中有行黑体字：请作者“蓉”晚间与本版编辑联络。

她常读《新明日报》副刊，发现这是该刊主编姚紫的一贯作风，他喜欢在版面上给作者和读者发讯息。姚紫是新加坡早期优秀作家和编辑，原名郑梦周。20世纪20年代出生在泉州晋江安海镇，1947年12月只身南渡新加坡。两年后他的第一篇中篇小说《秀子姑娘》在《南洋商报》连载，备受读者追捧；中篇小说《咖啡的诱惑》拍成电影后，亦轰动一时。他曾担任多家副刊和刊物的编辑，致力培养文学新人。为问明究竟，她给《新明日报》副刊打了电话，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人和蔼客气的声音，正是姚紫。他说，这篇《闺怨》就是她的作品，他认为用一个字“蓉”作为笔名对读者显得不够尊重，所以做主加了个“子”，变成“蓉子”，这既不影响原意，眼看还是耳听都都比较美。听了姚紫的话，她想，自己本名赛蓉，喜欢芙蓉，却嫌“赛”字有点俗，便爱用单字“蓉”，姚紫的建议有道理，从此在“新风”发表作品就常用“蓉子”。新加坡的“蓉子”由此从报纸副刊诞生。

副刊，通常是指报纸上刊登艺术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。中国的副刊出现比较早，从有了报纸以后就有副刊。鲁迅先生的《阿Q正传》、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和张恨水的“鸳鸯蝴蝶小说”等，都首见于报纸的文化副刊。中国大陆外的地区和国家，华文杂志凤毛麟角，文化副刊尤为华文作家们驰骋文笔、培育成长的重要园地。

姚紫无意间把李赛蓉命名为“蓉子”。恰巧，台湾地区有位著名女诗人叫蓉子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资讯比较封闭，没有网络，没有邮箱，更无微信，世界华文文坛远非如今这般交流频繁。直到70年代后期，西方的现代主义才从台湾地区传入新加坡，基本以诗为主，接受者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学人。

姚紫是位中华传统文人，70年代初不知台湾已经有位著名女诗人叫“蓉子”并不奇怪。否则，以他的性格，以他当时在新加坡文坛的地位，断不会让自己的作者重了别人名。李赛蓉当时不过是个家庭主妇，虽然喜爱读书，对国外文坛作家的了解和认知还比较少，接受姚紫的建议换笔名全然出于尊重。同台湾名诗人之重了名，全然无心。再说，台湾蓉子从没在新加坡发表过东西。当时不知台湾有位著名女诗人蓉子也不足为怪。未料，有人讥讽她有意借名人之“名”抬高自己，常以之作为箭簇，抽冷射一箭。面对嘲讽和打击，她暗暗较上了劲儿：“我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，座右铭：大石横前，弱者的障碍，强者的阶梯。”后来她索性到户籍处，加上中文名“蓉子”，将自己完完全全正名为“蓉子”。

蓉子开始写作，多因心绪无从诉，想借此给自己圈在家庭小天地、受娘家和婆家轻贱

的生命带来希望，带来力量，外加挣些稿费补贴捉襟见肘的家用，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。家务消磨了蓉子的精力，而一路为命运所激发出来的要强心，丝毫未变。在主流的男权社会，女人总是低男人一等，女人的使命是婚姻、家庭、孩子、丈夫，把一个家操持得有条不紊，服侍好男人和孩子，就是全部价值体现。传统观念把女性孤立于社会之外，为此 20 世纪西方便出现了关于女性主义源源不绝的思考。

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：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、受歧视的等级，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、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、让-保罗·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娃所说的“第二性”。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十分普遍，非常持久的。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，女性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、认知、观念、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，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，女性也处于男性之下。19 岁时的波伏娃曾发表过她的个人“独立宣言”，宣称“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”。

另一位被誉为 20 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的英国女作家艾德琳·弗吉尼亚·伍尔夫认为结婚生子从来不是女人的义务，而是一种权利。女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，至于这份自由是否值得你背负世人的疏离、道德的谴责，你是否有这般勇气去承受，只能自行掂量了。

按蓉子的环境，她当时对女性主义、西方女权运动，对波伏娃和伍尔夫未必有多少了解。但与生俱来，由于女儿身，所遭受的一切屈辱，让她天然同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：坚持选择自己的生活，绝不让自己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。她每天起早贪黑勤习写作，甚至彻夜不眠在厨房赶稿。伍尔夫有句名言，女人想要写作，必须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，还要每年 500 英镑的收入。蓉子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，更没有什么经济收入。

1976 年，她到新闻杂志社当编辑，又受教育出版社出版《电视周刊》邀约写社会信箱，以及不定期地主办座谈会、采访影艺界人物。当时她像钟点工一样，有时在电视台一边看电视剧，一边抄写剧情，在《星洲日报》的专栏“她的访员手记”由此产生。1977 年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编选了她历年在《南洋商报》《星洲日报》《新明日报》《文学月报》及《新加坡文艺》等副刊杂志，发表的部分作品，结集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《星期六的世界》，选入 30 多篇散文随笔，主要是她 70 年代初期发表过的文章。蓉子的作品取材于生活，言之有物、言之有理，文笔简明直接，叙事有己见，状物有特色。作为家庭主妇和初学写作者，蓉子的社会触角和视野难免受限，不少篇幅中点点滴滴断断续续的取材直接或间接多与自身相关，诸如家庭生活、孩子、丈夫、邻里、养父母、病痛、花草树木、亲情友情、生活感悟，以及对写作的想法，等等。

同年的 4—8 月，短短数月间，蓉子开始撰写三个专栏：《南洋商报》副刊《新妇女》版的“主妇随笔”，《星洲日报》妇女版，以及“江采蓉漫笔”。当时在新加坡，她是第一个写专栏同时也写小说的作家，很罕见两家华文大报同时采用她的专栏与小说。翌年，紧跟着《星期六的世界》，她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初见彩虹》问世。该书出版后短短一周便售罄，很快再版。《初见彩虹》出版第二年，更有《蓉子随笔》和小说《蜜月》《又是雨季》，脚跟脚紧随着同读者见面。

1978年,蓉子有一篇小说《凯凯的日记》荣获全国小说创作首奖,颁奖者是第三任总统蒂凡那。新加坡著名作家黄孟文称道说“在新加坡的华文文艺界,蓉子的名字相当响亮”。同年,她被邀请代表家长,亦是唯一的作家,上电视直播节目,与总理李光耀对话,讨论“两种语文的教育政策”。

蓉子本希望婚姻改变命运,不料仍然是苦海无边,没有回头上岸。逆境恶缘,20年的婚姻生活满含痛苦辛酸。每日以大葱萝卜干为三餐,经常被遣去杂货店为丈夫借赌本……她真想跳进大海,一了百了,寻求彻底解脱。后来终于解除了这段苦多乐少的婚姻,立志艰苦创业,自力更生。她有个信念:“20岁以前,如有苦难,不是我的错。20岁以后,再有苦难,一定是我之过。”是艰难困苦和不绝的厄运,磨炼和造就了今日的蓉子。正如法国文豪大仲马所说:“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由患难来促成的。”(《基度山伯爵》)雨果亦有同样的断言:“坚强,稀有的性格便是这样创造出来的:苦难,经常是后娘,有时却也是慈母;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;灾难是傲骨的奶娘;祸患是豪杰的好乳汁。”(《悲惨世界》)

从蓉子成长和经历看,她不畏艰难,勇敢坚韧,她的作品也展现作者自身的这种品格。

二、回国探亲后:生活重大转折为其创作注入新养分新活力

蓉子8岁随养父下南洋。地窄人稠,天灾人祸,靠海的地理之便,被动或主动下南洋挣钱养家,是清末民初,百多年闽粤一带百姓不得已的选择。

1983年,蓉子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:她的母亲获准到新加坡探亲。从她家乡到新加坡探亲的,她母亲是第一人。可见蓉子的一片孝心。如果说,8岁下南洋为蓉子开启了另一种人生,那么,母亲的到来,不啻是给自己女儿搭了一座桥。踏着这座桥,从此蓉子与故乡的联系日益密切,生活发生了又一次重大转折:新加坡—中国,中国—新加坡,不绝往返的崭新人生,为她的写作注入了新鲜的养分和动力。生活痛苦也罢,快乐也罢,她离开中国潮州故乡已经27年。被连根挖起迁徙的一棵小树,已经在移植的异国他乡成长。但无论树长得多么高大,她的枝叶总不忘向根部垂望。母亲探亲离去后不久她就回潮州探亲,从此她不绝往来于新加坡和中国。她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新阶段。

无论前期创作,还是探亲后的创作,都与她的生命历程密不可分。

回国探亲后,她曾经营花岗石生意、房地产中介,开办信封厂等生意,生活得到保障,独力供两个儿子读书成才。同时,她“文痴欲狂”,小说、散文、信箱,什么都写。当年新加坡,她是唯一同时在三家华文报写专栏的作者,高峰时期每周7篇,其中有答复读者的信箱,有与老作家的“唱双簧”,还有“中国行”“老潮州”及“蓉记小厨”等,自称“文坛杂牌军”。这些作品按题材大致分为:

(1) 反映爱情婚姻的社会信息。爱情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,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容和主题。蓉子更多切身感受,对此类题材,信手拈来,故其作品相关涉猎颇多。其艺术表现比较直接。

早期的小说《轨外》,谈的是子女教育问题。单线条的故事结构,明明白白的警世意

义。当时曾被改编成电视剧。更多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题材的作品，不是《轨外》式的虚构故事，主要见之于“秋芙信箱”。她曾为新加坡《电视周报》《联合晚报》《电视广播周刊》《新周刊》《新明日报》等报刊，主持“爱情与生活信箱”（即“秋芙信箱”）长达30余年，深受大众欢迎，名闻狮城。这些信箱文字结集成《未了情（一）》《未了情（二）》《你永远是最爱吗？》和《别碰！那是别人的丈夫》。为行文方便，姑且将其统统简称为“信箱文集”。

“信箱文集”透过婚姻、爱情和家庭中形形色色的问题，直接贴近现实生活和社会脉搏，反映社会众生相。她在充当心理医生角色回答问题时，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、人生态度、语言风格，都深深打着“蓉记出品”的烙印，特色十分鲜明。可谓“笔下离经叛道，别有笑料”的劝善金科。信箱中的语言特色，显然受潮汕一带民间歌册的影响。蓉子的“秋芙信箱”因其涉猎广泛社会问题，释疑解惑大胆敢言、切中肯綮，文笔机智幽默、情采并茂，所以其效果作用和影响力几乎盖过她的其他作品，收获了不少好评。

（2）道不尽中国情。蓉子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她眼里的中国。《中国情》《百万之爱》《芳草情》《悠悠中国情》《老潮州》，以及《戏言》《蓉记小厨》，即此之属。这类作品亦结集自报纸副刊，具有副刊文章的基本特点：紧贴时代、紧贴生活、紧贴作者的步履和视野，为文短小，轻松活泼。

自1984年回乡探亲之旅后，她的身影便日渐在中国，有时甚至一年之中，在中国的时间多过新加坡。探亲、文化活动、经商，三位一体，相互牵绊，潮州、汕头、揭阳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广西、河南、吉林、西安……到2000年年底，她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，接触过各类官、商、文化人及普通民众，体验过不同层次的丰富多彩生活，不免文思泉涌，话语滔滔。蓉子从小远离故乡，却未因数十年隔离断了亲情血脉的相牵。她一旦走近家乡，便如老房子着火，对潮州生出遏制不住的好奇和深情热爱。为写“老潮州”专栏，1998年她回潮州寻寻觅觅，认真做了田野调查，将老州的历史传说、文物掌故、豪宅建筑、工匠技艺、巨商宿儒、名人雅士、街谈巷议、民间俚语、贞女节妇、戏曲故事、恩怨福报、惩恶扬善、轶闻趣事、乡里风俗、语言特色、饮食习惯、山川风貌等等，整理记录，细致入微，加之自己的解析品评，通过报纸专栏一篇篇介绍给读者，然后结集成书《老潮州》。她曾为新加坡国庆献礼电视剧《潮州家族》当顾问，而耽误了暨南大学的研究生学业。

这个期间的创作，与上述婚恋题材和中国题材关系不大的还有两书。《烛光请》是作者办养老院的副产品，生动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远离沸腾生活、远离青春活力、远离子女家庭的一些病弱老年人，被边缘化的另一种残阳夕照的生存图景。《阳光下的牢骚》是她既往生活和感情篇章的选集。

三、他乡故乡：笔笔正能量 满满家国情

2000年，蓉子的长子许文威被派任新加坡驻沪总领事馆，任教育与文化领事。她作为家属随行，开始长住上海，从此她的人生又翻开新的一页。她戏称自己为“沪部尚书”。“沪”是上海市的别称，“尚”有“尊崇”之意。显然，蓉子的“沪部尚书”乃自谓住在上海的爱书人。

常驻上海后,照顾三个幼小孙儿孙女之余,写专栏、兼职多种社会工作,参加文学会议和新加坡与中国的交流活动。中国和新加坡,一个是她的故乡,一个是她的家乡。站在中国的视角,她既是“故乡人”,也是“他乡人”。无论“故乡”还是“他乡”,一笔写不出两个“乡”字来。乡乡筋脉骨血相连,两国的分量在她心里,几乎难分伯仲。在中国,她为地震、为自然灾害、为贫困儿童、为家乡办学,不断慷慨捐助,屡获各种殊荣。最令她难忘的是,2015年9月27日受中国国务院侨办之邀,出席66周年国庆招待会及登天安门城楼观夜景。

在上海开办的“蓉记餐厅”结束后,她探亲和生活在中国,各种缘由,曾经去过多次医院,发现中国缺乏方便病患的全科诊所。新加坡诊所十步一间,到处林立,十分方便。中国人只信仰医院,大病小病,头疼脑热,全往三甲医院挤。蓉子怀抱一个梦想:把新加坡的全科医疗模式搬进中国。家里的二儿夫妻皆是专家级医生,是她开办全科诊所的有利条件。她以坚强的毅力坚韧不拔的精神,克服种种困难,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开办了“新宁诊所”。一应经营大小琐细事务,她个人一力承担。2016年3月,她的诊所挂牌上市,这是中国第一家上板的医疗门诊,可谓一件划时代的大事。新宁诊所从一间开到4间,又落户广州。医德医术颇为病患推崇。

蓉子商务和社会活动繁忙,却仍坚持写新加坡的几个专栏。她常为赶稿彻夜不眠,飞机上,甚至卫生间马桶盖上,都能作为她赶写专栏文章的座席。她身在商海,心系文苑。常驻上海至今,出版主要的著作有《上海七年》《文化钟点工》《中国故事》,主编《鱼尾狮之歌》《玄奘之路》《品味上海》《品味潮汕》《侨批里的中国情》等。

《上海七年》,内容富赡,姿彩斑斓,以轻松灵动的笔墨,短小精干的篇幅,生动描述了蓉子一家人在上海的生活情态,并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艺术、历史地理、人情风俗、饮食男女、春夏秋冬等,比较全方位地展现了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腾飞的风貌。她对中国有赞扬有批评,赞扬发自内心,批评缘于爱之深。她为中国改革开放由衷欢欣赞叹,对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,其情绪起伏,缘于个人情怀和探索,与一般旅人或对中国抱成见者的视角和态度有别。

《文化钟点工》是她在新浪博客5年间200多篇博文的结集。不少文章曾同时见之于新加坡报章,亦主要反映她的多姿彩的生活。《中国故事》是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,为其历年关于“中国”的文章结集。说不完道不尽的中国情。《品味上海》和《品味潮汕》是她分别协助上海和广东侨办组织的海外华文作家文化活动,由各位作家撰写文章的结集。蓉子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久别祖国的海外游子重新认识中国。《鱼尾狮之歌》是她作为中国新加坡建交20周年的献礼,搜集精选了新加坡各类文体的诗文佳作。《玄奘之路》是她精选新加坡曾驻中国的华文作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,辅以国内相关学者的评文。新、中两国的文化人的一次合体出现,寓意着文化的归属和认同。

同《中国故事》同时间出版的,是蓉子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王列耀教授策划,由蓉子主编的《侨批里的中华情》。侨批是清末民初百多年下南洋的闽粤一带百姓写给家乡亲人的信,因为此信同时也是汇款单,故有别于一般只有文字的信件。闽粤发音“信”作“批”,故称之为侨批。无论是写给家乡亲人的信还是同时寄的款物,其中满含着亲情、乡

情、中华情，总之“侨批”的点点滴滴皆关情。蓉子策划主编该书并邀请写作者赴潮汕共庆该书的出版，体现了满满的家国情怀。

四、结 语

蓉子的写作，可以简单分两个时期。基本以她回乡探亲为线。前一个时期，她生活在新加坡，主业家庭妇女，生活圈子狭窄，写作的内容多与家庭、婚姻、孩子、身边琐事及社会闻见感受为主。与她同时期，新加坡一些比较著名的女作家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有不错的职业，在写作题材方面同蓉子类似。

女作家何濛说：“如果要女作家担负起一个重大的文学使命，狂呼时代的心声，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愿望，深入社会，批评现实和暴露黑暗，这恐怕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理想。”^①蓝玉坦言：自己的文学“圈子仍然是狭隘的，内容仍然是贫乏的甚至文笔也是粗劣的，幸好，在这些东西里，有我真挚的感情，真实的生活痕迹，它记载了我的笑，我的泪，还有我的满足和不满足，是我人生旅程上一段想抹也抹不去的生活记录。”^②虽然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们的创作题材比较普遍受限，但她们拥有特殊眼光和特别感受，笔触敏锐，善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创作成绩不可忽视。

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女作家，不管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，身兼多种身份。工作压力，繁杂家务，生儿育女的精神和时间耗费，蓉子还加上生活艰辛困苦。在文学日渐式微，尤其80年代初，新加坡将英文列为国家第一语言，母语列为次要，华文学校纷纷关停，华文普遍遭受冷遇，无疑使蓉子在内的华文写作者，受到了不小打击。但她不抛弃不放弃，依然进行华文写作，这便超出了个人喜爱、宣泄和改善自我的愿望，而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坚持和捍卫。

中国改革开放，她追着母亲的脚印回乡探亲后，一种崭新的生活、崭新的社会状态、崭新的各色人等，以及中国日新月异的飞跃，不断涌入她的脑海，她的视野、眼界大为开阔。加之，她完全走出狭小的家庭，独立勇闯世界，交游广阔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，参与丰富的文化活动等，为她的写作注入了空前丰富的内容。钱钟书夫人杨绛说过这样的话：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，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，百不称心，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。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，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。

2017年7月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史无前例地出版了一本硕士生论文：《潮籍作家蓉子与新中两国互动》，在发布茶会上，大学校长陈永财、陈燮荣大使、白振华议员、陈荣照教授、何乃强大医、吴多深总裁、陈再藩作家、潮州八邑会馆会长、黄锦西大律师、国家档案馆素春等社会名流、政商要人、文教彥士，济济一堂，足见各界对她的肯定。

蓉子永远以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行进在路上。

注释：

^① 何濛：《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——在区域女作家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》，《南洋商报》1982年3月

22日。

② 蓝玉：《西窗晨语》后记，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27页。

（白舒荣，女，编审，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《世界华文文学》杂志原主编，主要从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）